

人物传记

《戴德生小传》

第十一章 荣耀的恢复

一八六九年夏天，戴德生有着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他恨自己，他恨恶自己的罪，却没有能力胜过罪。他的内心苦苦挣扎，每天祷告、认罪、禁食、立志为善、勤读圣经，仍然没有果效。他愈靠自己的能力追求圣洁，愈活不出圣洁，直到他几乎绝望了。八月间，戴德生到杭州探访那里负责的同工约翰麦卡锡（John Mc Carthy），向麦卡锡弟兄谈到自己灵性上的挣扎经历，他所谈的其实也是麦卡锡弟兄当时的属灵光景。戴德生在回途中一路在想：“怎样向基督支取我所需要的？祂富足，我则贫穷；祂刚强！我则软弱。”

同年九月间，戴德生接到麦卡锡的一封信，信里说：“让爱我的救主在我里面，行出祂的旨意，住在基督里，而不是靠奋斗挣扎。”信的最后一段话，说：“不是努力去得着信心，或是祈求信心的增加，只须仰望信实的主就够了。完完全全地安息在爱我们的基督里面，时时刻刻地，永永远远地。”

读完这封信，戴德生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纵然失信，祂乃是可信的。”他不再挣扎了，他看到他与基督是合一的。

戴德生召聚同工们来读麦卡锡的信。“企图从祂那里乞讨丰富的恩典是错误的，我们是祂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祂的肢体，就像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啊，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竟与复活的主合为一体。”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玛丽亚因病逝世；戴德生平静地接受这个悲痛的事实。他关在房间里，独自面对神，他靠着神的恩典，已经刚强得胜了。他再次严肃地将自己奉献给神。

一八七一年八月五日，戴德生乘搭伏尔加号（Volga），离开上海，同船的有女同工福珍妮。福珍妮曾在五年前，和戴德生一起乘搭兰花号到中国。福珍妮到杭州后，办了一间学校，又带领了五十多人信主，为人聪明能干。他们在伏尔加号轮船上，已经互相恋慕。伏尔加号抵达法国马赛港后，戴德生、福珍妮就改乘火车到巴黎，四天后到达伦敦。到了伦敦，戴德生在征得福珍妮的父母同意后，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与福珍妮结婚。

戴德生续弦之后，没有和福珍妮度蜜月，夫妻两人都是内地会的同工，许多工作摆在面前，等着他们去处理，何况福珍妮还要照顾戴德生前妻玛丽亚留下的几个孩子。

一八七二年一月，戴德生一家人搬到伦敦培兰路（Pyrland Road）六号。培兰路六号便成了伦敦内地会的中心。但整个内地会在英国的总部，仍是在威廉柏迦在圣山（Saint Hill）上的住宅里。

搬完家之后，戴德生先到班斯泰埠，拜访弟兄会的领袖威伯门。威伯门对戴德生说，我每天都在访问你，意即威伯门每天都为戴德生祷告。戴德生接着到布里斯托拜访另一位弟兄会领袖慕勒，并在慕勒主持的伯赛大教堂讲道。

同年六月，戴德生应圣公会威廉宾法特牧师的邀请，到迈德美聚会（Mildmay Conferene）中讲道。在这

次聚会中，戴德生认识了同为讲员的美国大布道家慕迪。在迈德美聚会之后，中国内地会在伦敦的组织结构得到加强，增加了两位义务秘书。一位是理察希尔（Richard Harris Hill）；一位是亨利苏涛（Henry Soltau）。查理希尔的父亲老查理希尔，是闭关弟兄会领袖达秘的同工；老查理希尔又娶了弟兄会另一负责人亨利威廉苏涛（Henry William Soltau）的妹妹为妻。另一位内地会义务秘书亨利苏涛正是弟兄会第一代同工亨利威廉苏涛的儿子，小亨利苏涛的妹妹安妮斯（Agnes Soltau）则嫁给小查理希尔为妻。总结一句，内地会的一位秘书亨利苏涛，是另一位秘书查理希尔的小舅子。他们两个家族是亲上加亲。如今弟兄会的希尔家族和苏涛家族的第二代，联手起来，全力支持戴德生。

戴德生接着前往多田咸的弟兄会去拜访史达西姐妹和豪威尔两兄弟。多田咸的兄弟姐妹一直大力支持内地会的差传工作，豪威尔经营的药厂多年来赠送巨量的奎宁（quinine）药品，去治疗在中国无数的疾病患者。这次的交通，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成果，即罗伯特豪威尔的儿子，希尔多豪威尔（Theodore Howard）加入了内地会的管理层，这是另一个弟兄会领袖的第二代，加入了中国内地会，正式投入了中国的差传事工。希尔多豪威尔后来升任内地会管理委员会主席。

为了扩大中国内地会的支持力量，戴德生接受了几位义务秘书的意见，邀请有负担的，或有经济实力的基督教的领袖为推荐人（Referees）。Referees这个英文字很难恰当地翻译，在这里包括了赞助人的意思。被邀请为中国内地会推荐人的，包括有当年弟兄会中最有名望的、最有威信的负责弟兄：威伯门（Rober Chapman）、标利（Henry Bewley）、柯林渥（Willian Collingwood）、约翰豪威尔（John Eliot Howard）、约翰摩利（John Morley）、慕勒（George Muller）、拉斯多勋爵（Lord Radstock）、史密斯（Denham Smith）、亨利瓦利（Henry Varley）。

新改组的内地会在宣教事工上有了异象，强调要扶助中国的基督徒，使他们趁早自立。并且强调内地会要竖起十字架的标记，愿意接受最低的、最卑微的地位，追求与中国各阶层的人士和睦。

一八七二年十月九日，戴德生离开英国，再接再厉地，投入中国的差传工作里。戴德生到达中国时，所带来的款项，正好解决了在中国的同工们的需要。当时内地会在中国的同工已有一百位，加上他们的家属，每个月的支出实在十分庞大。戴德生在同工们彷徨无措、灰心丧志的时候，再次把同工们团聚在一起，并且勉励他们，提醒他们必须不忘当初神所付托的使命——带领中国人归向基督。

一八七四年六月，戴德生乘船到武昌时，扭伤骨头，倒床不起，十月份回到英国治疗。戴德生到英国后，病情严重，以致两小腿瘫痪，医生嘱他要长期卧床休息。这时戴德生正值壮年，才四十二岁，这个突来之病对他是一项沉重的打击。明知内地会有成千上百的事要他处理，他却动弹不得；他唯有天天为内地会和中国祷告。

一八七五年初，戴德生病在家中的时候，印发一项启事，要求各地信徒为数亿中国人祷告，并请在中国的弟兄姐妹，每天抽出一分钟，求神差遣十八人到中国作差传工作。戴德生夫妇并隐名奉献出四千镑，为中国的差传工作之用。

一八七五年四月，内地会向神所求的十八个宣教士，出发到中国。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戴德生在中国召集同工们到镇江开会，聚会时大家为差派七十个宣教士到中国恳切祷告。一八八三年，在英国受高等教育的基督徒响应了这项呼召，内中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这一年戴德生正在英国，剑桥七杰中有因他得着属灵帮助的。

一八八七年，戴德生已是五十五岁，他的信心并没有减退，他仍仰望神，再差遣一百名新的宣教士到中

国来。他还仰望神在那一年再供给内地会一万英镑的经费，结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在年终统计时，该年中国内地会收到一万一千英镑的奉献款，而蒙召到中国的宣教士，则是一百零二人，比起原先所求的，还多两名。